

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緊密聯繫起來，強調國家安全與軍事策略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作者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比較中西民族國家形成的不同的歷程。筆者以為這樣的研究視角使我們更具整體感地看到了社會生活的生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側面如何互相激發，推動社會發展至今天我們所見的面貌，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是一本能夠啟發我們思考的好書。

本書讀來令人意猶未盡之處是，作者在強調國家行爲的同時，勢必過多地關注邊疆擴張過程中的王朝單向度推進以及王朝如何創制帝國的想象，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那些在經由軍事征服已經納入王朝版籍的地域範圍內生活的人們，比方說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新疆的伯克勢力，比方說在更為底層的普羅大眾，他們又怎樣表達對帝國的想象？這是作者的研究中關注不夠的地方。筆者以為如能更平衡地把握二者的關係，或許能夠更加深入地回答「帝國何以被想象並維繫」的問題。

田宓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Dislocating China: Reflections on Muslims,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By DRU C. GLADNEY. London: Kurst & Company, 2004. xvii, 414 pp.**

在市場經濟轉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在日益增長，這將會給中國內部和周邊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Dru C. Gladney在2004年最新出版的書中試圖探討的問題。作為一位從198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中國穆斯林問題的學者，Gladney近年來把研究範圍擴展到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埃及等國的穆斯林群體中，嘗試從一個國際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該書共有16章，除去導論和結論，分為七個部份（每部分兩章）。第一、二部份介紹當代中國如何塑造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例如民族文化公園的建造，以及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尤其是田壯壯的《盜馬賊》。第三、四部份探討中國境內和境外不同的穆斯林群體的認同和塑造過程，包括北京、西北數省和福建沿海地區以及土耳其、哈薩克等地的中國穆斯林移民。第五、六部份集中討論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境內的穆斯林在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環境下，如何處理內部關係和對外關聯。第七部份則把視野轉移到後

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下，世界政治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

「Dislocating」原意指「錯位、混亂」等。在此書中，Gladney用這個詞表明，所謂的「中國」和「中國文化」並不是原來人們所認為的高度統一，而是內部有許多不同的成份；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近現代社會政治力量的產物，同時也仍處在不斷塑造的動態之中。這樣，Gladney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在Huntington影響甚廣的「文明衝突論」：因為並沒有一個同質的中國文明，不管是儒家、道教還是佛教都不能代表中國，衝突也就無從談起。

此書並不是一本「深描型」的民族志，而是以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視角，特別是運用兩位印度裔學者Spivak和Homi Bhabha的理論，來分析中國內部的不同。Spivak在〈臣屬者能說話嗎？〉一文中延續意大利共產黨理論家Gramsci對權力和臣屬的分析，認為臣屬階層（the subaltern）在殖民主義和本國統治階級的雙重霸權前，不可能有自己的聲音，只能是被動的客體【Gayatri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71-313.】；而Homi Bhabha則認為文化並非是同一的，裡面有許多異質的成份（hybridity）。在Gladney看來，少數民族、女性等正是中國的臣屬階層，他在導論主張以「臣屬階層」重新審視少數民族研究、女性研究等；他也希望本書能夠引發更多的中國研究者關注這些臣屬階層。Spivak等人的理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通過再現（representation）和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探討，來剖析臣屬階層是如何被表述和自我表述的。Gladney在書中的前兩部份就分析了當代中國文化工作者對民族問題的再現，如各地的文化公園和第五代電影導演如張藝謀、陳凱歌和田壯壯的作品。其中饒有興致的是對田壯壯的《盜馬賊》的剖析。

作為一部在中國國內反應寥寥（僅賣出七個拷貝；而通常的影片有一百個，見頁88），卻在國外影響頗大的電影，《盜馬賊》講述了西藏某部落一個以盜馬為生的青年被逐出部落，後又為生計所迫重操舊業，終於踏上不歸之路的故事。電影本身的敘事情節比較簡單，但耐人尋味之處卻不少。一方面，類似紀錄片的慢鏡頭將一個陌生的、原始的（甚至有點血腥）、宗教的西藏，展現在觀眾面前，如天葬、寺廟、草原等，這與以前電影中最普遍的表現少數民族人民載歌載舞歡慶解放的場景，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儘管導演將故事發生的年代置於1923年，但影片中那不時出現的暴力、災難以及被放逐的孤獨感覺，卻又總是不免讓觀眾聯想起文化大革命。因此，Gladney認為這部電影仍是在反映一種從漢族中心看西藏異域風情的心態，並

從這種邊緣的異域來反思中心的漢族：影片的製作者和對象仍是作為中心的漢族，而真正的主角藏人卻沒有了自己的聲音——電影的對白都是普通話，只有在唱歌和念經等極少數的鏡頭中才出現藏語（頁94）。

穆斯林研究是Gladney的研究專長，本書也是他繼*Muslim Chinese*和*Ethnic Identity in China*之後第三本關於中國穆斯林群體的專著。【Dru C.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8).】此書的新意在於，以往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多是關注其對外方面、對周邊國家的關係上，而Gladney則指出，它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或者說，臣屬群體）同樣深有影響。中國境內的回族其實包括許多不同背景的群體，「回族」的認同和塑造就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在漢族佔總人口數91%的中國，回族的地位似乎並不顯著。然而，事實上，回族不僅是中國人口第二多的少數民族（僅次於壯族），而且是世界主要的穆斯林居住地之一。Gladney指出，由於如此複雜的背景，怎樣界定回族，實際上在各地標準並不一樣。在西北，信仰伊斯蘭教是回族的民族特性——回民就是穆斯林；而在都市化的北京，回族通常是通過不吃豬肉，經商和特定職業（如玉雕工匠）等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在南部沿海的福建，則是通過族譜傳承等維繫民族身份。這樣，有東部／西部、城市／農村、穆斯林／非穆斯林等等對立，以及沒有一個共同語言（而這是斯大林界定民族的四個標準之一，中國官方的民族劃分很大程度上受斯大林四項標準影響），回族又如何成為回族？此外，除了回族，中國境內還有九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東鄉族等，它們和回族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Gladney認為回族並不是一個天然名稱，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學理論（如斯大林的四項標準），而是一個各種政治力量不斷塑造的結果。從血緣上來說，現在的回族是唐代以來到中國的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蒙古等士兵和商人的後代，儘管也與漢族或其他民族通婚，但大體上還是居住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群體中，且大多信仰伊斯蘭教。這種宗教和民族不太區分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回教和回教徒仍是對他們最普遍的稱呼。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新型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關係確立，反映在從「回教」到「回族」的轉變上。官方要強調中國境內的穆斯林是中國的一部份，將信仰的人群稱為「回族」（並根據語言等，分為其他幾個民族），這樣就將宗教和民族分開了，信奉的宗教依舊是世界性的伊斯蘭教，

但信仰的人群——「回族」則和其他伊斯蘭教區的人群區分開來，強調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回教」和「回教徒」的稱呼則沒有體現或強調這種區分。爲了強化這種記憶，回族共同的民族特性不僅是宗教、地域和語言等，更重要的認同方式是，他們是唐代以來外來士兵和商人的後裔。Gladney用了一個章節的篇幅描述了官方如何通過穆斯林墓地——拱北的傳說和索隱來構建「回族」的譜系，進而爲這種新的民族意識增加認同感。於是逐漸地，無論是地域上的差別（西北和東南沿海）、信仰的差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乃至語言（沒有共同的回族話）都不再成爲一個根本的民族界定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Hobsbawm等所指出的「被發明的傳統」那樣，「回族」這一20世紀中期創造出來的民族認同，逐漸成爲一條越來越堅實的民族界線。書中介紹一位漢族學者的觀察，50年代時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和回族都認爲自己是穆斯林，沒有太多的區別；而到2001年，他們更加強調彼此的不同。與此同時，不同地區的回族的認同則在加強，如西北的回族派遣幾位阿訇到福建泉州，去教導當地回民掌握伊斯蘭教禮儀——當地人幾乎已經不太懂得這些了。在經過合作化運動、文化大革命和承包責任制、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變遷後，「回族」的認同在當代越來越強烈。

另一方面，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穆斯林國家的關係，也是中國官方對境內穆斯林政策的重要基石。隨着蘇聯的解體，中國西北邊境上出現許多新的民族國家，如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這些國家和中國境內的穆斯林都有着密切的聯繫；同時歐亞鐵路和公路的修通，新疆地區和國外的聯繫增多，這些使中國的民族分離勢力有所增長，尤其是新疆的「東土耳其斯坦」分離組織；並且新技術的發展，也會產生新的鬥爭方式，如「計算機分離主義」，通過網絡宣揚分離運動。不過，Gladney認爲，儘管如此，中國西北邊境接壤的國家經濟上仍處於不發達狀態，而隨着中國政府和這些國家政治聯繫上的加強（如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這些分離勢力的影響終究有限。

在市場化的形勢下，民族意識又有一些新的變化。Gladney對寧夏和福建兩個回族村的調查表明，回族經濟水平高於周邊的漢族。固然，這和回族的經商、辦企業等傳統有關，但民族身份也是一項重要的資源：海外穆斯林的投資、宗教團體的捐贈、國家的優惠政策等等，而這種經濟上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回族民族意識的增強。

Gladney所擔憂的是，在當代中國全球化和市場化程度加劇的情況下，原

有的共產主義乃至儒家思想都無法產生巨大的吸引力，而唯有民族主義（甚至是大漢族主義）成爲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這種民族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可能不是周邊國家（因爲它們不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版圖內），而是內部的臣屬階級，包括少數民族。Gladney借用了「內部的殖民化」來形容這種趨勢——中國的新疆、西藏、內蒙、雲南、廣西等都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

或許是因爲各章節在不同時寫成的原因，此書的結構並不是特別嚴謹，比如一些關於回族背景知識的介紹就反覆出現。不過對此書而言，更大的挑戰來自它的論點。對於族群關係的研究，有着三種基本的觀點，一種是所謂的原生論（*primordialism*），認爲維繫族群認同乃是一些天然、原生的因素，如語言、血緣等；另一派工具論（*instrumentalism*）則認爲，族群認同乃是一種後天的建構過程，是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產物。更新一派的建構論者（*constructionist*）的觀點則更進一步，擯棄了上兩種觀點的極端之處，既承認族群認同之中有一些長久、牢固的因素，也強調後天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建構成份。【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Gladney也是更傾向於第三種觀點。近20年來，許多學者都越來越注意到中國少數民族的族性的建構問題，而Gladney所面對的問題也許更爲複雜，回族地域分佈之廣、內部經濟和文化的差異，是其他少數民族所罕見，這也讓他的分析框架更爲複雜。不過，Gladney似乎對於回族自身的能動性（*agency*）的關注還不夠。他想要問的是，在國家和市場等外部的壓力下，作爲臣屬群體的回族，還能自己說話和說自己的話嗎？但從後現代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本身似乎就隱含着這樣的一層意思——不管臣屬群體怎麼說，「聽者」都只是聽他自己「想聽的」。因此，最終的吊詭是，無論是說話的人或是聽眾，都並非作爲主體的回族本身，而「真正」的回族也許永遠只能隱藏起來。這可能正是後現代理論所無法解決的困局。

雷仕偉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